

风雨 如磐

邢文军 陈树君 著

西德尼·D·甘博的中国影像 1917 ————— 1932

- 甘博和照相机 杭州 1908/NN3
甘博和弟弟 杭州 1908/NN2
七只帆船 长江 1917/007A/035
三人马戏团和神 白水寨至茂州 1917/061A/330
飞沙宝塔 去苏家村的路上 1917/017B/171
甘博在独轮车上 新都至成都 1917/070A/384
长城和烽火台通道 北京 1917/125/705
车和运沙袋的船 天津 1917/100/558
甘博和甘博楼 杭州 1918/047B/499
御岛桥 杭州 1918/054B/578
孙中山先生和艾迪牧师 广州 1918/140/791
基督教青年会的楼房 北京 1918/313/1793
甘博和夫人伊丽莎白 北京 1925/494/2849
哈默、傅路德、甘博在妙峰山 北京 1925/503/2909
甘博(右一)、晏阳初(前左四)和平民教育运动发起人 北京 1925/535/3098
穿过城门的车辆 定县 1931/576/3338
学生的和平庆典游行 北京 1918/212/1178
太和殿阅兵徐世昌总统致辞 北京故宫 1918/218/1217
青年会门前的学生演讲(一) 北京 1919/260/1486
学生演讲和警察 北京 1919/260/1487
学生被捕 北京 1919/261/1493

风雨 如磐

西德尼·D·甘博的中国影像

1917 —  1932

邢文军 陈树君 著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如磐:西德尼·D·甘博的中国影像:1917~1932/邢文军,
陈树君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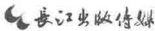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54-8260-0

I. ①风… II. ①邢… ②陈…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1917~1932—摄影集 IV. ①K26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6142号

策 划:安苏苏
封面设计:棱角视觉
责任校对:赵 娜

责任编辑:吴 双 张 婷
特约编辑:赵 娜
责任印制:张 涛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83670231)

<http://www.cjlap.com>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张:26.5

版次: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130千字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010-83670231进行调换)

前 言

1988年仲秋，在纽约市花园大道800号的一套公寓里，我第一次看到西德尼·D·甘博70年前在中国拍摄的近5000幅黑白照片和保存完好的底片。

当我一本一本地打开12册巨厚无比而又沉甸甸的相片簿时，在地球的另一面纽约大都会的一栋高楼大厦中看到了数千幅十分清晰的祖国城乡和百姓生活的影像，而且其中无数幅照片均拍摄于我多年生长、学习和极为熟悉的首都北京，我的心震撼了！

一个巨大的问号随之而来：这个美国人是谁？他的身世如何？他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到我的祖国？他在中国跑了多少地方？他的目的仅仅是旅游和摄影吗？他何以能够记录下民国早期中国发生的诸如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孙中山逝世等重大历史事件？他是不是唯一一位在民国初期1917—1932年这段时间全面系统地用相机见证和记录中国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民俗和城乡居民生活的摄影师？如果不是自己孤陋寡闻，为什么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位摄影师？他在中国还做了哪些事情？从每一幅照片底片上的编号和记录文字，能看出这是一位心细无比的学者，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受益于哪些学术研究思潮？

这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我对西德尼·D·甘博、他的摄影和他有关中国城

乡社会调查研究的本学术著作的极大兴趣。经位于纽约市的华美协进社介绍，我结识了出生于中国的甘博的长女凯瑟琳·甘博·科伦夫人，并开始了对于甘博摄影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协助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华美协进社和史密森尼学会共同筹备了首次甘博摄影的北美巡回展。《两次革命中的中国——西德尼·D·甘博 1917—1927 摄影展》选用了甘博的 81 幅照片，于 1989—1992 年在纽约市和北美地区共 19 个城市巡回展出。

这一系列的问题也成为我在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攻读中美现代史提供了一个极其有意义的博士论文课题，在经过近三年的研究和在历史系导师的指导之下，完成了《社会福音、社会经济学和基督教青年会——西德尼·D·甘博和普林斯顿北京中心》这一博士论文。

正如 1926 年出生于中国的科伦夫人所说，甘博摄影北美巡回展的成功使她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将甘博摄影带回到她父亲毕生研究和热爱的中国。作为西德尼·D·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中国部主任，我先后联系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上海博物馆等多家单位和机构，希望能够从甘博摄影档案中精选一批照片在中国展览，广大的中国观众从中回顾一下近百年之前中国的历史和人文。在经历了近 10 个年头之后，基金会终于通过北京海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海蒂女士的努力，成功地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举办甘博摄影展览。科伦夫人、华美协进社副社长贾楠女士、海音公司的总策划海蒂女士和我共同从甘博摄影档案中精选了 210 幅照片，设计制作了一个大型的摄影展，于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庆典之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成功展出。《风雨如磐：五四前后的中国——西德尼·D·甘博 1908—1932 年中国摄影展》在甘博基金会和科伦夫人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在 1999 年到 2007 年近 10 年中，在中国 27 个城市巡回展出，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观众

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媒体如身临其境般重温了近百年前的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民俗和城乡百姓生活。2007年科伦夫人不幸逝世，巡回摄影展不得不中断。2008年年初，科伦夫人的家人将摄影展展出的全部展品捐赠给首都博物馆收藏。

科伦夫人在世时资助了甘博的《北京的社会调查》和《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两本书的中文翻译，《北京的社会调查》中文版2010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也即将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

十分感谢西藏长江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决定以《风雨如磐：五四前后的中国——西德尼·D·甘博1908—1932年中国摄影展》的精选照片为基础出版本书。在这里我要向以下机构和人员致谢。

感谢杜克大学授权免费使用所选照片。杜克大学图书馆在接收了科伦夫人捐赠的甘博摄影底片之后，将所有底片数字化，并进行了分类整理，增加了索引，向全球读者开放了甘博的摄影档案，为全球学者和普通读者研究和了解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感谢北京海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海蒂女士及其团队策划和组织了甘博摄影在中国27个城市的巡回展览，展览的文字介绍为本书提供了基本素材。

感谢深圳的陈树君先生在他的工作之余对本书第三、第四、第五章进行了改写，并对其他各章提出了宝贵的意见。陈先生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照片的挚爱，多年来以微博形式发表他对于甘博照片的拍摄地点和历史背景的研究，使我在通过网络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得以结识他，也使本书得以早日问世。

西藏长江时代图书有限公司的张婷女士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同时也令人钦佩地容忍了我在编著过程中就相关问题对她十分粗鲁的指责，她的积极努力和配合使本书的撰写编辑和出版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表示歉意和致谢。

当然，我要真诚地感谢科伦夫人、她的家人以及和甘博基金会多年来对我研究甘博所给予的支持和资助；感谢华美协进社和贾楠博士把我引荐给了甘博基金会，有幸参与了一项极有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摄影研究课题和摄影巡回展览。

最后，我要感谢夫人李振琴女士。多年来她为了全力支持我攻读博士学位和创办《中国汽车要闻》，全力担负起了家庭和养育子女的重担。没有她的无私贡献，我不可能完成学业和本书的写作，也不可能二十年如一日主编和发行全球唯一以中国汽车市场信息和情报为内容的系列英文出版物。

邢文军

2015年7月于北京

引 言

西德尼·D·甘博摄影镜头下的中国

邢文军

西德尼·D·甘博(1890—1968)是一位社会经济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摄影家，终生致力于中国城镇和乡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

1908年到1932年，甘博先生先后四次访华。第一次在1908年清朝晚期，他刚刚高中毕业。1917年到1932年间，甘博三次旅居中国，自费担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研究干事，负责城镇和乡村调查。在甘博的任期内，他用他的摄影机建立了一个有关中国的图像档案——总共5000幅黑白照片和彩色幻灯片以及30盘16mm电影胶片。这些影像资料抓住了处在重大历史变革时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即将崩溃，又面对内战的混乱，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正在兴起。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北京中心的义务成员，甘博主持了对中国北方城镇和乡村的社会经济调查，协助在北京进行社会服务工作，成为西方在中国引进社会学教育和开展社会学工作的先行者。

四次旅居中国

1908年，甘博随父母和弟弟第一次来中国。他的父亲戴维·B·甘博（David B. Gamble）刚刚从家族企业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 Co.）辞去了秘书和司库的职务。老甘博因为健康原因决定提前退休，并举家从辛辛那提迁往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建造一栋新房的同时，老甘博夫妇应日本、朝鲜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带着两个小儿子到远东做了一次长途旅行。

仿佛命里注定，甘博随父母在中国的第一次旅行，使他和中国结下了毕生不解之缘。他对伟大的东方文化深深着迷，为她的贫穷而震惊，对她勤劳好客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甘博自己的话说，他的第一次访华像是一只东方的昆虫，叮咬了他一口。

你们还记得挂在布莱尔宿舍22号窗前的朝鲜风铃吗？这个风铃是我被一只东方昆虫叮咬的象征——你很难从这种叮咬中康复。它后来把我带回到中国，带回到北京普林斯顿，它使我对第一个东方城市完成了首次的社会调查，发表了《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书。

邀请甘博一家访华的主人罗伯特·F·费佩德（Robert F. Fitch）是杭州的一位传教士，同时是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费佩德介绍甘博认识了一位在四川省会成都公立大学任教的奈特（Knight）教授。奈特给甘博和费佩德翻看了他在四川地区拍摄的部分照片。“奈特不过是个业余摄影爱者，”费佩德回忆道，“他的作品远谈不上完美，但他迷人的照片集表明，中国对摄影师和探险家而言是个天堂。”费佩德答应，如果甘博有朝一日回访中国，他一定带年轻人到更偏远的内陆地区进行摄影远足。

在普林斯顿读完大学本科并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甘博的确再次回到中国。

1917年6月至9月，甘博同费佩德和另一位杭州的基督教牧师约翰·H·亚瑟（John H. Arthur）一起，从上海出发沿扬子江而上，长途跋涉，深入

到四川省西北部羌族和藏族居住的边远山区，总行程超过 6500 公里。这个“美国三人马戏团”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拍摄了 1000 余幅关于中国人民的生活、劳作、文化和风俗的照片。

摄影远足一结束，甘博加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1917 年到 1919 年、1924 年到 1927 年以及 1931 年到 1932 年，甘博作为一名志愿者，先后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干事，并就职于燕京大学基金会。他对中国的城乡做了广泛的社会经济调查，结果发表在五部主要著作中：《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1933）、《定县—华北农村社区》（1954）、《1933 年之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1963 年）和《定县秧歌选》（1970）。

甘博旅居中国期间，从未停止过按动那台 Graflex 牌照相机的快门。到 1932 年回国时，他积累了一整套价值很高的影像档案，包括 5000 幅黑白照片、几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灯片和 30 卷 16mm 电影胶片，记录了涵盖中国北部、中部、东部、西南和南部地区的城乡社会生活。

鞋盒子

然而直到 1984 年，甘博的这批丰富的照片，包括原始底片、幻灯片和电影胶片都被存放在纽约家里的阁楼上，没有人注意和照料。甘博于 1932 年最后一次访华，之后随着日本的侵华，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和“冷战”对抗，使他失却了在有生之年再次访问中国的任何机会。甘博的照片档案，正如他的长女、在中国出生的凯瑟琳·G. 科伦夫人（Catherine Gamble Curran）所说，是“偶然地，通过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巧合”，在甘博 1968 年逝世 15 年后才被重新发现的。

1984 年在普林斯顿亚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科伦夫人惊讶地发现“投射在墙上的一些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幻灯片是父亲拍摄的，这些幻灯片美丽而着

色奇异。”科伦夫人是普林斯顿亚洲协会的董事。新上任的协会主任杰森·P·艾斯特（Jason P.Eyster），对普林斯顿亚洲协会的历史和甘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非常感兴趣。为了发现更多有关甘博的资料，艾斯特拜见了甘博的遗孀伊丽莎白·甘博。甘博夫人将艾斯特领到家中三楼上，有一个壁橱，壁橱里有几只檀木盒子，里面存放着几百张人工着色的彩色幻灯片。另外的几个鞋盒子里装满了近6000张黑白照片的底片。这些保存完好的底片和彩色幻灯片，以及后来发现的30卷电影胶片，是西德尼·甘博在1917—1932年三次旅居中国期间拍摄的，其中一小部分是他随访日本、朝鲜和苏联的照片。作为一名一丝不苟的学者，甘博不仅为胶片和幻灯片编了号，而且标明了每张照片的地点、时间和内容。与他发表的著作一样，甘博这些未经发表的照片也是一个研究中华民国早期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资源宝库。正如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教授所指出的：

甘博从三个不同的方面研究中国，同时又能将这三方面融合为一体：第一，他坚信基督教会有助于中国摆脱贫困和落后；第二，他在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研究方面受到的专业训练，使他能够积累调查资料和数据为社会改革作准备；第三，他热爱摄影，照相机的镜头成了他关注时代危机的一只眼睛。

1984年甘博的照片被重新发现后，甘博的长女和其他家人于1988年向读者推出了《1917—1932年西德尼·D·甘博拍摄的中国和她的人民》摄影集。之后，甘博中国学研究基金会、纽约华美协进社和华盛顿史密森学院巡回展览部共同主办了《两次革命中的中国：西德尼·D·甘博1917—1927年摄影展》，该展览在1989年和1993年之间在北美的19个城市进行了巡回展出。

毕生的事业

1902年，纽约的一些职业摄影师成立了“摄影退盟”组织，使现代摄影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次年，第一本摄影刊物《照相机技艺》出版发行，专

门介绍欧洲和美国名摄影师的作品。19 世纪末现代摄影的飞速发展归功于几项重大的技术性突破：放大技术的出现缩小了相机和底片的尺寸；1889 年乔治·伊斯特曼（George Eastman）发明了使用附着感光乳胶的胶卷；8 年后大规模发行的报纸成功地刊用了照片。新技术使业余摄影成为可能，人们可以通过邮局把胶卷或胶片寄出去冲洗和加印。

甘博的摄影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作为青少年的嗜好，继而成为校园的主要课外活动，最终成为他对中国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的写实记录，并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成就。

甘博对摄影的兴趣源于他的父亲。其父爱好机械，对照相机很着迷。通过他的影响，摄影成为两个儿子西德尼和克莱伦斯的嗜好。1900 年小甘博得到了他的第一个望远镜头，三年后获得一部 5×7 照相机。从辛辛那提的初中到加利福尼亚州欧海市撒切尔私立高中，甘博始终用他的相机拍摄校园的生活，并多次获奖。1907 年，撒切尔高中的创始人在给甘博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欣赏你出色的摄影作品，感谢你的照片给全校师生员工带来的喜悦。”

甘博一家经常在国内外旅行，加深了他对摄影的爱好。也使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选择了一门颇有兴趣的学科——自然地理。之后甘博成为美国地理协会和伦敦皇家地理协会的终身会员。

1908 年到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旅行，使甘博第一次接触了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这次旅行中，甘博和弟弟在中国上海、杭州以及日本和朝鲜拍摄了 300 余幅照片。甘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摄影成为他的一项重要的课外活动。他以摄影为校刊服务，并由此而有所收入。甘博在普林斯顿有一间额外的卧室，既是储藏室又是暗室。1909 年他上大学二年级时写道：“新生入学恶作剧期间我努力工作，拍了一批好照片。”甘博由此获得 114 美元的收入，这笔钱恰好足够购买一台 Graflex 半自动相机。

自全家 1908 年第一次访华之后，甘博就始终盼望着有朝一日回中国做摄

影远足。为此，他很早就接触到 19 世纪后期拍摄中国社会的出色摄影家费利斯·A·比托（Felice A. Beato）和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的作品。1917 年 5 月，甘博第二次踏上中国国土时，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与比托和汤姆逊相比，与早期在清王朝灭亡前夕，试图拍下中国风景、宗教和建筑的永恒影像的德国摄影师恩斯特·波世曼（Ernst Boerschmann）相比，甘博的摄影作品有着更高的建树。甘博把基督教人道主义者的情怀和专业社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洞察力结合在一起，因而可以以独特的眼光透过他的镜头为他的摄影作品增添历史学、社会经济学、社会学和美学的内容。甘博在 1917 年的摄影远足中拍摄了 1000 多幅照片，后来的 16 年当中又拍摄了近 4000 幅。他的摄影遗产不亚于西方任何一位专业摄影师在中国的摄影作品。

西方摄影在中国

鸦片战争中西方用大炮顷刻间轰开了中国的港口，紧接着照相机撩开了神秘的面纱。比托作为英法远征军的半官方随员，是第一位到中国北方拍照的西方摄影师。比托随军在 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沽口之后，拍下了遍地是战死的中国士兵的照片，而后在被占领的北京又拍摄了目前仅知的圆明园的早期照片。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被英法联军所焚毁。

随着中国主要港口的对外开放，专业摄影师和商业摄影师也来到了中国。来自欧洲的摄影师 M. 米勒（Miller）活跃于广东和香港一带，专门从事人像摄影。苏格兰摄影师汤姆逊在中国旅行了约 8047 公里。除访问北京和天津地区外，他乘船溯长江而上，抵达湖北和四川。毫无疑问，汤姆逊是 19 世纪末到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进行摄影的最著名也是成果最丰的一个。

20 世纪初，照相机小型化和塞璐珞胶片的应用使业余摄影迅速发展。随着专业和商业摄影在中国的发展，一批业余摄影师也随着西方的炮舰政策和商业

扩张来到中国。西方传教士、医生、教师、科学家和外交官等带着他们的照相机，拍摄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照片，或发表于书刊，或成为博物馆或私人的收藏品。但是主要对中国摄影有所贡献的，也是几名欧洲的业余摄影师。英国植物学家厄尼斯特·H. 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受英国皇家植物园和哈佛大学阿诺尔德植物园的派遣到中国工作。作为一名出色的业余摄影师，他在拍摄中国植物的同时，深入到中国乡村拍摄了1500余幅乡村的风光和人物。威尔逊可能是最初几个进入渺无人烟的中国西南四川省部分地区进行探险的人之一，探险的结果被记录在他的《在中国西部的一位自然学家》（1913）一书中。

几乎同时代的另外两位有名的业余摄影师是商人。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受雇于香港、广东和澳门的轮船公司，这使他有機會详细拍摄了这几个地区的水道，作品发表在《广东和西江指南》（1910）。唐纳德·梅尼（Donald Mennie）先后在北京的麦克塔维士及利门公司和A.S. 瓦特逊公司工作，使他有機會先于甘博数年拍摄清朝晚期灭亡的景象。他在摄影集《北京的演变》（1920）中，试图运用摄影刻板艺术展现一幅罗曼蒂克式的中国风光。甘博是进入中国摄影的首批美国摄影师之一，与前述早期的欧洲摄影师相比，甘博的照片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他在中国旅行的距离和汤姆逊相仿，走遍了十几个省份和无数的城镇村落。在前后25年的跨度下，他拍摄了从清代末期到民国初期的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他在四川西北部和北京拍摄的大量作品比威尔逊和梅尼的摄影更加引人注目。

历史的见证

甘博的照片风格融纪实、素描、民俗、社会学和艺术于一体。他的照相机抓住了旅居中国期间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其中最具意义的是1918年华北和天津的大洪水、紫禁城的停战和平庆典、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孙中山的葬礼、1925年五卅惨案和20世纪30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

甘博的照片的风格和 20 世纪写实摄影大师路易斯·汉因 (Lewis Hine) 相似，甘博记录了 1919 年五四运动头六个月在北京发生的主要事件：天安门前的学生示威；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北京街头演讲；警察逮捕学生，并将他们关押在临时监狱；以及全城规模的示威游行。

甘博详细记录了 1925 年 3 月 20 日在北京举办的孙中山葬礼。甘博对中国的丧葬礼仪很感兴趣，但他同时意识到孙中山“是民国早期一位著名而又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孙中山的葬礼对甘博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难得的摄影题材，因此他记录了从北京协和医院开始，在中央公园结束的整个仪式。中央公园由此改名为中央公园。

甘博用他自己拍摄的照片为他的每一本社会学著述配图。这些高质量的照片提供了中国城镇和乡村生活的影像，令人印象深刻，与他著述中细腻的文笔相辅相成。甘博的两本关于北京的书中收录了这样一些照片：通县鞋匠、满族贵夫人、骡轿、“结实无比”的北京大车、骆驼商队、送水的独轮车、乞丐、人力车车棚、旧式和新式监狱、劳苦大众的住房和富裕人家的庭院、神龛和门神、婚礼和葬礼等。他在关于中国北方乡村生活的两本书中选用的照片有：乡村祠堂、农家院落、打场脱粒、手工纺线、守青、乡村集市、乡村铁匠、制砖和纺纱等。雅各伯·瑞斯 (Jacob Riis) 作为报刊记者常常给自己的文章配发照片，甘博拍照的目的则不单纯是为了他的学术著作配插图。摄影和社会调查是两种不同的创作形式，一种是影像艺术，而另一种是纪实文学。甘博雄辩地将这两种不同的形式结合起来，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用写实的手法加深对人类生活和苦难的理解。

永恒的主题——人

甘博的摄影兴趣并非只在异国的风景和建筑上。从他的收藏中很容易找到此类照片，不少可以与早期汤姆逊、梅尼、威尔逊和波世曼等西方摄影师的作

品相媲美。《飞沙宝塔》（见 022 页图）描绘了四川西北部山区一座破败的高塔，画面雄伟而又神秘，富有诗意的塔名和久经风霜的宝塔给人一种深沉的文化艺术上的享受。《万县桥》（见 014 页图）像是一幅漂亮的水彩画，令人回味。甘博的摄影镜头也并未忽略那些古老的宫殿和庙宇，如紫禁城、颐和园、天坛、十三陵、承德的避暑山庄以及文华殿、雍和宫、孔庙、灵隐寺、泰山寺庙等。

然而，甘博的照相机的镜头首先对准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人和社会，这和他在高等院校所受的专业培训完全一致。在甘博的 5000 多幅照片和 500 多张手工上色的幻灯片中，绝大多数的主题是人。甘博的照片中收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婴儿、幼儿园的孩子、学校的学生、童工、学徒、农夫、苦力、算命先生、教师、商人、官员、年事已高的人等。他的目的是记录中国人民是如何生活、工作、组织、学习、娱乐、祈祷和经受困苦和磨难的。如果对甘博的照片就题材进行分类，最引人注目的是：城镇和乡村的工业和手工业、农副业生产、庙会市场、宗教、民族和民俗、婚礼和葬礼，以及所有反映人类生活历程的写真。

甘博用相机抓住了既在变化之中又是永恒的中国。5000 多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地劳作，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甘博虽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一事实的人，但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同时用笔和照相机将这个文明古国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成功地凝固下来。尽管 19 世纪末期出现了轮船和铁路，20 世纪初又出现了电车，但中国依然还是一个靠双肩、双手和双脚生存的国家。工人、工匠、农民和家庭主妇以手工劳动为他们的衣食住行增添着每一件必需品。甘博的摄影镜头几乎涵盖了城镇和乡村中所有的手工业：纺纱线、织布匹、织丝绸、织地毯；制剪刀、做火炉、编篮子、造铁锅、造纸张、打家具、钉鞋子、编草鞋、拉铁丝、编绳索、造铁铲、造大车和做棺木；弹棉花、磨粮食、染布、抽水、锯木等。

在缺乏现代化的运输方式的年代，客运和货运要靠成千上万的人力车夫、

独轮车夫和轿夫等苦力的双脚和双肩。甘博在四川山区的摄影远足就曾雇用了15名苦力为其一行三人和17件行李服务。记录人力运送木材、茶叶、烟草、盐、草鞋、粮食、水等货物的生动照片，在甘博的收藏中比比皆是。

人道主义的情感

甘博深知中国人民在经受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惨和苦难。甘博的镜头不时地对准了乞丐、倒毙路旁的尸体、洪灾后的难民、赈灾粥棚旁等待施舍的人们。但是，甘博并不是作为一名旁观者来记录这些悲剧的。他对一贫如洗的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心，这种人道主义的情感使他的相机变成了他和异国人民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缩短了甘博和镜头前百姓之间的距离。科伦夫人回忆说，她后来陪同父亲访问印度时，发现父亲能够很快地和当地普通老百姓融合到一起。“他一下飞机就带着相机到街市上游逛。……即便语言不通，他也能打听出小贩卖的是什么，能卖多少钱，能赚多少钱……随后，他便为他们拍照。”

很少有摄影师能像甘博那样，把人道主义的情感融合于自己的摄影之中。甘博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始于他在高中和大学时代的社会服务活动和社会经济调查。1919年甘博在北京写道：

我觉得在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应该找机会密切接触一下他周围人们的生活。我本人在大学期间接触到社区问题、劳教团体和社会救济，对此我非常庆幸。如果学生们在校期间接触不到任何社会问题，毕业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他们一旦走出校门，踏入商业社会，往往没有可能也没有兴趣再去考虑社会问题。于是，他们对“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会一无所知，而没有这种知识，他们不会有兴趣去关心周围人民的生活。

《通县鞋匠》（见194页图）是一幅充满人情味的作品。微笑的鞋匠看上去60多岁，他直视着相机，手上拿着针线在纳鞋底。鞋匠脸上历经风霜的皱纹，他那双结实的双手，破得不能再破的衣衫，以及简单的补鞋工具，这一切造就